

抗战初期，女青年会乡村服务队在潼南

林 琼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在重庆纪念“一二·九”的集会上，川东特委杨德基（又名杨述）通知我交代原来的工作，去参加女青年会乡村服务队，到潼南县去工作。还说明了去该县的任务和接头的关系。就这样，我参加了女青年会乡村服务队。在重庆女青年会内，全体队员经过短期的学习和抗日救亡宣传资料的准备，於十二月下旬出发到潼南县，直到一九三九年约八、九月离开。

一、女青年会乡村服务队的基本情况

女青年会是中华基督教会进行女青年工作的组织。在抗战初期，由於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扩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全国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女青年会中也涌现一些进步的抗日力量，我党又及时地调派了一些党员进去。因此，当时在重庆的女青年会是在我党的影响下。这些进步力量利用女青年会有做乡村工作的传统习惯，为深入乡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建立了乡村服务队。从一九三八年春开始到秋天，是在璧山县工作，当时队员不到十人。到潼南以前在重庆休整期间扩大了几个队员，我就是这期间参加的。

在潼南期间队员先后约有十六、七人，其中党员六人。队长李经

(党员)她是女青年会的干事。队员有：李淑芳(党员)、曾繁狗、冯淑清、尹锡荣(在潼南时发展的党员)和她的母亲、许天仪、林梅(又名戚云，党员，一九三四年初四至五月来潼)、罗琼、朱运芬、林琼(党员)；已记不清名字的有唐某(党员)、范某、王某，记不清姓名的还有两、三人。林琼任党支部书记。女青年会的干事刘玉霞和陈瑞霞也有时来检查和指导工作。

队员中除共产党员外，都是无党派的热情抗日的女青年(只有尹妈妈是中年)，文化程度都是大、中学水平。当时除供给队员的伙食外，只发给少数零用钱。

在重庆学习期间，曾组织听过一些进步人士的报告。记得在听周奋韬的报告时，会场被反动军井包围，讲演被迫停止。最使大家激动和受到深刻教育的，是我们的邓颖超同志到女青年会来看望我们，给我们讲了话，还和我们全队队员及女青年会干事等合影留念。至今我们有些同志还记得她对我们说：“抗战十大纲领就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希望你们继续深入农村，唤醒民众，组织妇女，将抗战进行到底”。我们在潼南的工作就是遵照她的指示进行的。

二、在潼南的任务

女青年会乡村服务队的公开任务是到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为妇女服务的工作。我们党支部的任务是：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团结全队队员，到农村去进行抗日宣传，以教育发动群众，并通过群众工作，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在潼南县建立党的组织。

三、活动情况，宣传地点、内容和方式

1、争取当地党政各界的支持。

由於开展抗日 羣众工作的需要和在当时形势下有争取，团结国民党中一切能够团结抗日的力量的可能，加上我们是以基督教所属组织的身份去工作的。因此在潼南，我们争取当地上层的工作还是较顺利的。李坚队长负责对外联系工作，经常和潼南伪县长赵秉衡、国民党书记长陈孔安打交道，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开展活动。记得在一九三九年元旦那天，该县专门召开了民众大会，由县长赵秉衡主持，介绍我队来潼南工作。我队代表在大会上进行了抗日的讲演。以后每逢纪念日特别是在红五月里“五一”、“五三”、“五四”、“五卅”纪念日和“七·七”抗战纪念日，全县举行较大规模的宣传和纪念，都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们也积极主动地同抗日宣传直接有关的民教馆和中、小学的责任人加强联络工作，使我们在发动中小学师生及社会各方面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

我们到乡镇时，也重视做联保主任、联保队付，镇上保长和小学校长的工作。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能采取支持的态度。有的虽不积极支持，也不敢公开阻拦。只有在古溪镇，遭到的阻力很大。

2、联络和发展中、小学师生及社会青年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和为抗属服务。

我队初到潼南和各乡镇时，都要贴出大幅宣传标语，以后每逢纪

念日和举行各种活动时都要贴标语。标语内容有“打倒帝国主义”、“拥护抗战纲领”、“坚持抗战到底 反对妥协投降”、“团结起来 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打倒汉奸、卖国贼”、“妇女们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妇女要争取政治经济上平等”、“改善妇女生活”等等。我队还经常利用赶场出壁报、漫画，进行街头宣传——唱花鼓、救亡歌曲、演街头剧、讲演等，每逢开大会的机会，也要演出抗日戏剧和抗日救亡歌曲，还自编抗日的小歌剧。

因我队人数不多，要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主要是联络发动中小学教师、中学生和社会上的爱国知识青年来进行，在城区，唐纯祖等发动、带领一批小学生到农村巡回演出；在寒假期间，队员李淑芳（党员）与唐纯祖、米学渊等一起，发动了一批县中学生、社会青年到各乡镇巡回宣传。在双江镇与刘钰、曾足希一起发动青年学生、在乡青年和爱国人士组织了双江镇抗日宣传队和抗敌后援会。

在县城，由於有一批积极分子，我们就推动和协助他们组织了涪潮剧社、歌咏队等群众团体。在农历新年和红五月，我们在城区和双江等地，还与当地各界青年一起到附近农村去慰问出征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写信、割麦、医病，并督促乡保按时发放出征军人积谷。

我们还组织知识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如《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廿讲》、《共产党宣言》等，并经常阅读新华日报，学习讨论政治、时事。

当时的宣传内容主要是：日寇侵略的野心和暴行，中国人民受蹂

躏，东北人民当亡国奴的痛苦，妥协退让必然失败亡国，只有动员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才能坚持抗战到底；团结起来，坚持持久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全国各界人民要积极参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宣传中，我们还根据不同对象，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运用各种实例进行宣传。比如对学生和知识分子，我们就从理论上驳斥“片面抗战”，“速胜论”，“亡国论”的观点，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对农民和妇女我们就更加注意采取各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和论点，对妇女还结合讲妇女参加抗日与争取解放的关系，对不同对象提出的行动要求也不同。比如，由于当时国民党已丧失了大片国土，群众中对抗战能否胜利的悲观论调很多，我们就运用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在敌后的游击战等事例，以《论持久战》为武器来鼓舞人们的信心。

特别是我们运用歌咏、戏剧配合这些口头宣传，取得极好的效果。如在街头宣传中我们总是以抗日救亡歌曲开头、结尾，中间插花鼓戏、金钱板 and 自编的抗日歌词进行宣传，效果都很好。“松花江上”的演唱，使群众情不自禁流着眼泪，领会着亡国的痛苦和悲愤，“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鬼子去”等歌曲又激动着群众的抗日热情。所以在宣传结束高呼口号的时候，群众和我们都情绪激昂，台上台下连成一片。以后我们就利用这一有效的方式，到处教唱救亡歌曲。不论在学校里，在群众集会上，在妇女识字班、训练班中，以及在群众劳动的场坝里都大教抗日救亡歌曲。抗日救亡的歌声到处飘扬，抗日救亡的道理和热情也随之不断深入与高涨。宣传所到之处，

抗日的烽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3、深入妇女群众之中，进行抗日宣传和妇女解放教育、识字教育，并开展为贫苦妇女服务的生产、福利工作。

由于我们乡村服务队工作的重点是妇女，而要发动妇女群众，只靠一般地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细致地做教育工作。所以我们在县城一开始就重视家庭访问。派队员分别到双江、柏梓、塘坝、古溪等四个乡镇去深入工作。去双江的是我和罗琼；朱运芬去柏梓；林梅、冯淑清去塘坝；曾繁猷、尹锡荣去古溪。

我们到各乡镇去的队员，一般都是住在庙里，有的让给我们一间办公室，有的只是一间卧室，一张方桌，几个人挤在一起，一人一张木架子铺、竹编的铺板床，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因为生活比较艰苦，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到这些乡镇，首先和经常做的是进行家庭访问，访贫问苦，以接近妇女，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疾苦和他们交朋友。这些乡镇的妇女，有的从事农业辅助劳动，有的在家纺棉纱，有的从事家务劳动，还有极少数是帮助家庭做小贩。但他们都深受封建的束缚，不但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就是在家里也受父母或丈夫的管束，更不知道国家大事了。我们初到时，他们对我们这些二十上下的年轻妇女毫无约束的东奔西跑，颇感惊奇。年轻的抱着好奇心，冷眼观望；年老的摇头叹气，都不敢同我们接近。经过我们多次地走家串户，问长问短地关心她们，向她们说明我们的来意，逐步深入地说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正在遭受日本鬼子的侵略，向她们宣传日寇

是怎样的奸淫妇女，屠杀同胞，烧毁家园，强占国土。我们多数是外省人，所以现身说法，向她们诉说自己的家乡沦陷了，自己的父母兄弟不知是死是活，没有下落，我们不能上前线去杀敌，就要到处宣传同胞们起来抗日。感动得她们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抗日、救亡的火种引燃了她们的愤怒之火。同时，我们还在交谈中，了解她们的生活和痛苦，进而向她们宣传，只有打走日寇，才能过好日子；妇女为什么比男人还要苦，妇女要解放，一定要抗日等通俗的道理。这样，她们渐渐和我们接近了，有些人主动地来找我们，有的人主动地请我们到她们家里去。

与此同时，我们带着简单的药品，在赶集的时候和平日到乡下去为妇女儿童治简单的疾病。比如，那时由于群众生活太苦，很多妇女、儿童生疥疮，孩子生癞痢头。我们用硫黄软膏治这种病是很有效的。那时候天花仍然在威胁儿童的生命，我们就给孩子种牛痘。对于生活非常贫穷的妇女，我们利用女青年会的生产费给她们贷款买棉花纺线。在当时群众极度贫困下，多少起了一点有利于妇女儿童的作用，同时，也使我们更易接近妇女群众。

在初步接近妇女群众的基础上，我们就举办妇女识字班。来学习的都是成年已婚和未婚妇女，个别的也有四十多岁。她们都是在我们进行初步的教育后有了学习文化和抗日的要求，排除了种种阻碍和困难来学习的，有的父兄和丈夫不让来学习，有的有孩子的拖累，还有社会上的冷嘲热讽。我们帮助她们劝说了父兄和丈夫，安排了家务，

置社会上的非议於不顾，坚持学习。识字班的课本，用的是《抗日三字经》，我们还经常给她们在课堂上讲抗日的道理和妇女解放的道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这些长期在封建束缚压迫下的妇女，一旦有了文化和抗日的要求，她们学习的劲头和热情是十分高涨的。我记得参加双江镇的妇女识字班学习的妇女，有些经常很早就到识字班来等候上课，有的抱着孩子听课，有的在家里边做家务边识字、唱歌，双江的周淑清，在镇头摆了一个小摊，手上总是拿着识字本本，一有空就摊开来学习。经过约二、三个月的教育，参加学习的妇女很多成为积极分子，她们除了能识一些字外，还懂得抗日的基本道理和妇女解放的简单道理。

对于妇女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我们还利用课后和家访的时间，进一步给她们讲中国的前途，介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苏联的妇女和人民的生活，指出只有跟共产党抗日才能走上解放的道路，使这些在黑暗的天地里生活的妇女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获得了现实斗争的力量。她们多么渴望解放，多么勇敢地参加了抗日的活动，在两三个月教育的基础上，在妇女积极分子带头下，我们还组织识字班的妇女走上舞台表演抗日救亡歌曲；走出家庭小圈子站在集市街头宣传。这是一件多么鲜明的变化啊。一九三九年五月，一个夜晚在双江镇举行抗日火炬游行示威（用千藤杆做火炬）队伍上千人，其中竟有一支不小的妇女队伍。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闭塞的农村里，又是多么难得可贵啊！火炬代表着群众的抗日热情，也反映了妇女渴

望解放的热情在燃烧。

在我们即将告别这些乡镇前，我们的住处整日不断地有妇女来送行。有些妇女在我们面前哭，在家里哭，舍不得我们离开。她们不是舍不得我们几个人，而是生怕失去现实斗争的成果，生怕未来美好的希望幻灭啊！

在离开双江镇的前夕，我们帮助她们中的积极分子建立了姐妹团，在城区，塘坝等处都建立有姐妹会。

古溪乡由于地处偏僻，这里的妇女受封建的束缚更严重，许多已婚和未婚的年轻妇女从未出过大门，更不敢在集市上露面。经过我队同志的宣传和教育，有些已婚的年轻妇女敢于冲出大门，去赶场买卖农副产品。在市场上听了我们抗日宣传的妇女回家后就互相传说，妇女们赶场的也逐渐多，有的赶场时到我队员的住处来。可是有的被父兄赶回，甚至遭到家法的处分。我们就引导妇女用道理说服父兄和丈夫。经过细致地工作，逐渐排除了对妇女的封建束缚，使妇女得以参加识字班学习和抗日活动。“七·七”事变两周年时，组织举行小型舞台表演抗日歌曲，我队演出了“送才郎”独幕歌剧。这次演出在古溪农村造成很好的影响，掀起农村唱救亡歌曲的高潮，偏僻的古溪乡也到处飘荡着抗敌的歌声。

古溪镇的反动力量采取了卑鄙手段，破坏我们的宣传，造谣说：“我队员住的庙里有鬼，每到深夜庙里有鬼叫声”。弄得群众不敢进庙，有些基本群众白天也不敢来了。为粉碎他们的阴谋，我们动员妇

女积极分子在团丁中的亲友，配合我们去“捉鬼”。经过数夜苦斗，随着呻吟的方向寻找出一个隐藏在佛象石匣中的流浪汉。问明本人，方知他有病，生活无着，躺在石匣里，乡公所叫他做鬼叫声，每天就给他一顿饭吃。通过这一事实，教育群众识破了反动力量破坏抗日的真面目，同时也破除了迷信，促进了群众觉悟，对我们的抗日宣传反而起了好作用。

为了使更多的乡镇中的妇女受到抗日的教育，我们在县城还举办了妇女训练班。由于得到伪县政府的支持，规定各乡镇送来的妇女由各乡镇负责交纳她们吃饭的口粮（包括大米和红苕）和菜金，集中住宿。时间大约是一个月。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抗战教育，妇女解放教育，教她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和进行慰问抗日军属活动。结业时组织她们搞歌咏宣传。这些由各乡镇送的妇女，有的是乡镇、保甲的亲友，有的是他们为了完成任务“拉”来的农村贫苦妇女。经过我们的教育，其中大多数妇女的抗日热情高涨，特别是贫苦妇女还能结合农村妇女自己的遭遇，倾诉妇女所受的压迫。结业前我们对她们提出：回去后在妇女中进行抗日宣传的要求，还找县长来讲了话，表示态度。

4、我们党支部发现和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为重建潼南县的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我们党支部在县城和我们工作过的乡镇，通过抗日救亡的活动和群众工作，发现了一些坚决抗日，思想进步，积极工作的分子。在活动过程中，考察他（她）们的抗日觉悟、工作热情和对党的认识。又

通过谈心的方式，进一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宣传中国应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以提高她的政治觉悟。对于经考察认为条件成熟者，再个别谈心，进行党的性质、任务、纪律等教育。在此基础上，我们先后发展了一些党员，我发展了唐纯祖、曾足希、刘钰、杨尚淑；林梅发展了李问农；李淑芳发展了唐景坤。

我们发展了党员后，向川东特委汇报。川东特委与川北特委联系，派王叙五同志于一九三九年春天（约五月）来潼南联系。当时是由我与王叙五同志在潼南一家旅馆接头，我介绍唐纯祖与王见面，并将已发展的潼南党员的组织关系交出。王叙五同志负责与唐纯祖同志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潼南县的地下党的组织。至此，完成了潼南地下党的重建工作。以后我们支部党员与潼南地下党组织就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我们如发展党员，就由我转给唐纯祖。

四、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与迫害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妥协投降活动的加剧。一九三九年发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大后方，国民党也日益加紧破坏人民的抗日活动。

在古溪乡，他们企图通过唆使闹鬼阴谋，破坏我们抗日宣传。被我们团结抗日的群众揭穿后，反动派见阴谋未能得逞，又玩弄花招，指使团丁来队捣乱，强迫占用庙宇，要我们的队员迁出。我们坚持与他们说理斗争，他们却变本加厉，要我们限期迁出。在我们的处境十

分恶劣时，羣众支持了我们，一农村妇女主动让出他家堆杂物的一间小屋，欢迎我们搬去住，使我队得以坚持开展工作。后队部考虑只有一、二队员在该乡，恐遭不测，把队员调回了县城工作。

一九三九年约八、九月，当我队到北碚整休回潼开展工作不久，县里的反动力量就经常阻挠我们开展活动。最后，反动派派地方军并持枪到我队部来捣毁我们的宣传资料，撕毁壁报、漫画和标语。并下令停止一切活动，立即解散乡村服务队，迫令队员限期出境。当时我已离开他调（在北碚整休期间离队）。为了保存力量，以便继续坚持斗争，李经决定，采取分散撤离的办法，有家的同志分别回家，沦陷区的许天仪同志去参加路过潼南的民族剧团，李经等撤回重庆女青年会，有的党员同志由组织调走，另行分配工作。

乡村服务队在潼南的抗日活动，虽以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告终，但是燃起的抗日烈火，却是愈烧愈烈。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留下了革命的火种，我们党的地下组织深深地扎根在潼南的人民之中，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附：女青年会乡村服务队自编歌曲一首：

干 一 場

1 123·2 1·21 6—|6·1 6 5 | 35 6 5 | 3·3 3 2 1·2 | 3·23|
河 里 水 黄 又 黄 东 洋 鬼 子 太 猖 狂 昨 天 烧 了 王 家 寨 哟
1 1 2 3 3 | 1·2 176—|1 1 1 5 5 1·7 6 | 3 3 3 3 2 2·7 6 |
今 天 又 占 我 张 家 庄 逼 着 那 青 年 当 炮 灰 逼 着 那 老 年 运 军 粮
3 3 3 2 1·2 3·2 3 | 1·2 3·5 1 5 | 6——0: ||
这 样 活 着 有 啥 用 哟 拿 起 刀 枪 打 东 洋
干 一 場。

米峪镇战斗的前前后后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李 振 刚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了。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参加者和见证人，在我心中至今还珍藏着许多难忘的记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并吞中国。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久山西省城太原就失陷了。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我家乡山西省静乐县第六区岔儿上行政村晋阳掌自然村。他们在静乐县城和丰润、静游、娄烦等地分别建立了日军据点，又以据点为中心，每三十华里建立碉堡，以传递军情，进村扫荡。当时我十三岁，就眼见到日军在家乡的土地上杀人、放火、抢劫，我的父亲，就是在敌人扫荡进村时，被日军杀害的。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在县、区人民武装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我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参加了村上的儿童团，为地方的民兵组织站岗、放哨、送信，保卫全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一九四〇年，日寇开始了大扫荡，静乐县遭到了敌人的大破坏。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三分之一；牛、羊减少十分之六；驴骡减少十分之

八、九：耕地面积仅有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农业产量降低三分之一。那时，我十六岁，参加了民兵，担任晋阳掌自然村民兵分队长，配合八路军一〇二师三五八旅六团作战。帮助群众空室清野，把粮食、物资藏起来，一迁敌情，我们便掩护群众转移，和敌人在山头周旋。平时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放哨一直放到敌人的岗楼底下，侦察一直派到敌人的据点里面。我们还担任前哨作战或配合作战，进行高度分散的“麻雀战”，随时随地杀伤敌人，使正规军充分发挥其威力，米峪镇战斗就是一例。米峪镇，地处晋中地区，东邻镇城底，南接岔口，西靠关帝山，北挨汾河水。这是敌人进行扫荡的中心据点。为了卡住敌人的脖子，堵住敌人的去路，上级指示我们民兵包围据点，安放地雷，烧掉敌人城里的两个营房大楼。於是，我们在疙沟自己建立的小兵工厂里，搬运去大大小小的地雷，小的三、四斤，大的百十斤，组成连环地雷，在米峪镇的中心区、要道上、村口、水井、门房、空地上到处都埋设好地雷。敌人最怕地雷，被我们活活地围困在米峪镇，断他的水，断他的粮，断他的物资，断他的通讯，断他的交通。敌人四处无援，被我们包围了三天三夜。接着我们又发动群众，把自己家的门板卸下搬来，把炕上垫睡的草席拿来，把刚收获的稻秆运来，把这些东西安放在日军住的两个大楼周围，再淋些煤油、桐油，点上火，只听得噼哩啪啦的巨响，一夜之间，两座大楼化为灰烬，二百多日军，全被烧死在里面。

一九四二年夏天，敌人依靠交通网、碉堡和沟墙，把根据地封锁

割裂起来，然后进行“清剿”和“扫荡”。因此，破坏交通，毁坏碉堡，折平沟墙，是我们民兵反“蚕食”斗争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对米峪镇通往娄烦据点的公路一条条被我们截断；四周碉堡一座座被我们摧毁；横顺沟墙一个个被我们折平。为了夜间偷袭娄烦，我们做了半月的准备。我们六区去了三个民兵中队，当时我是岔儿上行政村民兵中队长，与二区和五区的民兵配合，一共四、五百人。凭借我们的双手，挖通了穿过护城河底的地道，直通娄烦镇敌人据点城楼瞭望所。那天夜里，凭着我们对地形熟悉，搭起人梯，摸进敌营，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走了敌人大批武器和粮食。等到天亮敌人知道时，娄烦据点周围死一般地寂静，没有响一声枪。我们把从敌人手中夺得的果实全部交给了县的人民武装委员会。后来，我们中队分到五条三八式步枪。

日军不甘心米峪镇和娄烦据点被我们民兵袭击的惨痛失败。他们从太原调兵五六千人云集静乐县，同时加紧交通的修建，仅一年时间，便修通了从太原到静乐的公路。在此期间，公路上尘土飞扬，人叫马嘶，汽车运载一车又一车士兵，运送一车又一车物资。为了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各村在高坡上建起了通讯联络的戴草木庄，只要日军出发扫荡，便点火为号，有如昔日古战场上的烽火台。这时，各村民兵便迅速带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有一次，日军扫荡进了我们村，村里十家九空，不但见不着人影，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只得垂头丧气地溜回县城。

为了摸清娄烦据点敌人的情况，还得感谢我们的“二村长”。这就是村子里的两面政权，一方面要帮助八路军为之提供军需品；另一方面也要应付日、伪军，为之办一些躲不脱、推不掉的杂务。但多数的二村长是为八路军忠心耿耿办事的，是我们自己的人。那次我们胸前佩戴的“良民证”就是二村长给办的。我和王补新、李玉海等五、六个民兵扮着樵夫、菜农多次混进娄烦镇据点，与我党在城里工作的同志接头。一次我们进城去，抓住了出卖我党组织部长的汉奸王青云；又一次我们进城去，走到关帝庙前，见日本军官正在给士兵训话，我们几个眨了眨眼睛，会意干掉他，几颗手榴弹迅速的扔了出去，在敌人的队伍中开了花，当场炸死十余人，伤二十余人。待敌人清醒过来时，我们已从西门溜出城去了。

八年抗日，近三千个日日夜夜，我们要生存，要斗争。靠的什么？那就是“劳武结合”，一手扛枪，一手握锄，用战斗保卫生产，用生产支援战斗。我们民兵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帮助群众播种、收获，枪支架在田坎上，掩护群众生产。如迁敌情，帮助群众转移。为了适应敌后的战争环境，县、区都成立了“生产战斗指挥部”，从组织上解决了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问题，同时，根据地理形势和战斗的需要，组织村与村之间民兵联防，把变工队和爆破队结合起来，一村有事，数村增援，合力围歼敌人。

当时，有一首在我们民兵中流传的歌谣“一九四四年，全面总动员，打日本除汉奸，就在这一年。”激动着我们每一个爱国同胞

扛起枪，奔向抗日救亡的战场。

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取得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记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光辉思想指导的胜利；是全国亿万军民流血牺牲，英雄奋战的结果。

今天，我们来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本身就是生动的教科书。我们要大力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斗。

※ ※ ※ ※ ※ ※

（接24页）要实现这一光荣而伟大的新任务，更需要我们像搞抗日宣传工作那样，不计报酬，不谋个人私利的艰苦奋斗精神；更需要我们忘我地劳动，夜以继日工作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应当继承、发扬抗日战争宣传工作的好精神、好作风，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